本版编辑：木　言
E-mail：z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124

发挥反面典型警示震慑作用

□ 王玉堂

最近，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研讨中，以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反面教材，聚焦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深刻总结反思，汲取教训、引以为戒，真正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严起来、实起来。这一通知，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发挥反面典型警示震慑作用”的要求，是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向深入的重要抓手。

善于抓典型、用典型推动工作是一门重要的领导艺术和有效的工作方法。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先进”的可以认为是典型，“后进”的也可以认为是典型。先进的是正面典型，具有示范作用，就像一面旗帜，引领着时代前进的方向，给人以鼓舞和力量，是一种有形的正能量。后进的是反面典型，具有警示作用，尤如一把戒尺，时时敲打着人们的心灵，给人以警醒和深思，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正效应，具有警示作用、撼动人心的警醒作用、触及灵魂的震慑作用，具有“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的规矩作用。

发挥好反面典型的警示震慑作用，前提是要能抓出反面典型。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对抓典型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这就是善于抓正面的而拙于抓反面的，过于单一。而反面典型往往包涵着问题，记录着失误，凝聚着教训，一旦人们认识清楚，即可起到正面典型无法替代的教育鞭策、惩处警示和引以为戒的作用。作为一个称职的领导者，不仅要善于抓正面典型，而且也要善于抓反面典型。那么，怎样才能抓好反面典型呢？

从工作的薄弱环节上抓反面典型。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工作进展总有好与差、快与慢、强与弱的情况出现。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及时、准确地控制进度、掌握速度、把好方向，善于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并选择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部门、个人或事件作为反面典型，进行重点剖析，从中找出原因，研究对策，做好落后面的转化工作，使差的好起来，慢的快起来，弱的强起来，提高工作的整体水平。

从群众关注的热点上抓反面典型。群众情绪历来是我们党工作的晴雨表。群众关注的热点，往往就是我们工作的弱点、难点和重点。能不能把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处理好、解决好，是对一个领导干部工作能力大小、群众观念强弱的检验。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群众观念强的领导干部，就要敢于碰硬，善于从“乱子窝”中抓典型，用典型作反面教材，化解矛盾，教育群众，稳定社会。

从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中抓反面典型。领导干部不仅要善于谋全局、抓大事，而且要善于知动态，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反应要敏锐，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对个别具有典型意义的问题，要紧紧抓住不放，查成因，找症结，论危害，议对策，下大气力予以解决，把各种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全局工作不受影响。

从违纪违法案例中抓反面典型。一个个鲜活的违纪违法案例，本身往往就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里面饱含着痛心的忏悔、沉重的反思和深刻的教训，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重大案例作为反面典型进行剖析，无疑能够产生强烈的教育和警示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查处了一系列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不仅表明了中央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一次生动、深刻的教育，推动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查处的河北省沽源县平定堡镇党委书记岳树旺为其女大办婚宴收取礼金的典型案例，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行为起到了震慑作用。

抓反面典型，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自身修养。打铁还需自身硬。加强领导干部的自身修养，是抓好反面典型的前提和保证。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之所以反面典型抓得少甚至抓不出来，除工作方法上的问题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领导干部自身素质不过硬，对反面典型不想抓、不让抓、不敢抓。因此，领导干部要善于抓反面典型，就必须善于完善和提高自己，要有动真碰硬的底气、揭短亮丑的勇气、敢于交锋的正气，使自己首先成为立得住、过得硬的先进典型。只有领导干部素质高，才能有抓典型的意识和资格，抓反面典型尤其如此。加强领导干部的自身修养，一是要坚定理想信念，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不动摇，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进一步提高政治鉴别力，能够见微知著，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清正廉洁，不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二是要有政治家的胸怀和胆略。抓一个反面典型，往往会触及一些地方、部门或个人的既得利益。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敢于碰硬。要客观公正，不抱个人成见。要有勇气，不信邪，不怕担风险，不怕打击报复。三是要切实加强领导艺术的锤炼。能够对所负责的工作进行科学决策，有科学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并能运用自如地领导职责范围以内的工作。

发挥好反面典型的警示震慑作用，要善于解剖。对于一个反面典型，需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广泛挖掘素材；需要有较高的认识水平，对材料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归纳、概括、提炼、升华，搞清反面典型形成的土壤和主客观条件，从中探求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以达到总结教训和教育警示、引以为戒的目的，同时也为建立防范机制和措施提供依据。

要善于抓转化。抓反面典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激励、鞭策后进，使他们变压力为动力，负重奋进，迎头赶上。作为领导干部要善于帮助后进典型摆问题，查原因，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同时还要多做一些说服教育和疏导激励的工作，帮助他们尽快走出阴影，加快转化，达到抓后进、促平衡的目的，从而推动整体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平县委党校）

时政连线

胡适的治学三要

□ 刁兴泽

胡适，安徽绩溪上庄村人，他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又是中国古典文化研究大家，还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尽管在他身上也体现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但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他的学术成就源于其读书做学问好的习惯。纵观他的一生，其读书做学问的好习惯主要是“勤”“慎”“谦”。

读书做学问不偷懒、不懈怠。胡适认为，勤苦耐劳是成功的基础，读书做学问更不能自欺欺人，所以非“勤”不可。“勤”首先表现在他读书刻苦和兴趣广泛。他年轻时在上海求学，曾一度对算学很感兴趣，常在宿舍里熄灯后演算问题，由于宿舍里没有桌子，他便将蜡烛放在帐子外的床架上，自己趴在床上，将石板放在枕头上做算学题。因为太用功，一段时间他的耳朵几乎全聋了，幸得时常锻炼才逐渐康复。胡适是一个读书广博的人，几乎各个领域无所不涉，他还自称有“书癖”。“勤”又表现在他多动手上。中国旧时私塾教育讲究读书必须三到，即眼到、口到、心到。胡适认为，只有三到还不够，还要手到。手到就是多动手，主要包括标点分段、查阅字典和资料、作读书笔记。而读书笔记又包括抄录备忘、提纲节要、笔记心得、探讨研究。他说，这样读书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和审美进行选择，经过自己动手的东西，往往了然于心，甚至终生不忘。对于做学问他同样多动手。他认为该看的书一定要看，该参考的工具书一定要动手去翻，该写的文章一定要搜肠刮肚动手写出来。在他看来，掌握和研究材料比方法更重要，重视材料是“小心求证”所必需。在台湾时，胡适对傅斯年敬佩有加，特别赞成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说法，道出了胡适寻找材料“勤”的习惯。“勤”还表现在他晚年仍坚持用功。胡适晚年读书如命，就是在住院期间，他还对前来为他看病的医生说：“我是有看书习惯的人，看书不吃力的。请你跟院长商量，让我看些轻松的东西。”

谨慎、小心、不苟且。认真负责地完成每件事情。“慎”首先表现在他对私塾教育有自己的体味。他认为，眼到就是对每个字甚至每个字的笔画都不能简单放过，都要认真研究，否则会闹出笑话。口到就是“诵读”，每一字句都要念出来。这样有助于熟悉句子的结构、体会文章的气势、风采和韵致。心到就是用心思考和分析研究，力求做到“比较参考”和“融会贯通”。如《诗经》里“于”“言”字甚多，在不同地方用意不同，如果不用心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慎”主要表现在他做学问上。他每次演讲几乎都强调“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科学精神，也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没有证据不下结论。他认为，越是大胆的假设，思路就越开阔，但最终要证明它，必须讲究“小心”二字，这就是“慎”的习惯。如他考证《红楼梦》。他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自传。在做了这样的假设之后，他便四处寻找材料进行论证。他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还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版本如《庚辰本》等。论证发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受皇帝器重，曹家几代人几十年把持江宁织造，和皇家的关系非同寻常，又将贾宝玉、宁国府、荣国府和曹雪芹现实家世相比较，证明他的假设还是准确的。再比如，他对《醒世姻缘》作者的研究，从小说的情节、成书的时间、地域范围和语言习惯等，论证该书的作者就是蒲松龄。后来，这一间接论证得到了为蒲松龄刻书的鲍廷博亲言证实。

态度谦虚。治学万不可先存一点成见，总要不分地域门户，一概虚心加以考察之后，再决定取舍。不仅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他认为真正的谦虚，既不妄自尊大，也不轻信别人。对于前者，要有“方法的自觉”，对于后者，唯一使人信服的是证据。“谦”表现为他虚心向外学习。胡适在肯定清朝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多地认识到其局限性，把眼光投向西方。他曾列了一个表格，按照年代罗列出中西各自的重大发现和进展，一经对比，他发现中国人研究的材料是文字，西方人研究的材料是调查和实物。他举了瑞典校勘者加礼文的例子。加礼文仅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便编出了《中国文字分析字典》，一举超过了中国学者几百年的努力，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学者仅仅伏案不离开文字本身，不像加礼文那样走访汉口、广东、宁波、北京等各处实地调查。“谦”的习惯又表现为他更加注重证据。如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全祖望、赵一清《水经注》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的学者，如山西的张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杨守敬、浙江的王国维、江苏的孟森，他们都是十八世纪享有盛名的考古学者，一般读书人都被他们的大名压倒了，但胡适为了证明戴震的清白，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近万个证据分析研究，终于还了戴震清白。

胡适一生对读书做学问运用自如，强调习惯重于方法，而他“勤”“慎”“谦”之习惯，其实是极其朴素和平常的道理，但这正是当今多数年轻人所缺乏的。

（作者单位：山东省茌平县委党校）

随　笔

廉臣陈廷敬

□ 朱一华　王子惠

陈廷敬（1639年—1712年），清代泽州人。为官53年，升迁28次，历任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他为官期间清正廉洁，以身作则，不畏权贵，以公心反腐，对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很有借鉴意义。

严于自律，为政清廉。陈廷敬一生居官恪慎清廉，鞠躬尽瘁，素以廉洁传世，《清史稿》给他以“清勤”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在礼部任上时，曾饬下家规严令：“自廷敬始，在部绝请托，禁馈遗。”直面当时“律例”不敌“陋规”的沉疴痼疾，抵制了当时各种名目的请托和行贿，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打破了多年无人指责的“潜规则”。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元月，身为礼部侍郎的陈廷敬接到管理户部钱法的临时任务。甫一上任便表明心志：“此天下钱之所由出也。吾自矢不受一钱，愿与诸公同之。”在署理铸造铜钱的职务中，发生了著名的“奉还二钱”故事。其一钱为：某日在废铜中出现一枚“秦半两”，众人皆说古钱为吉祥之物，陈廷敬便作为饰物佩戴于身。其二钱为：在临时管理户部钱法的过程中，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下属官员带新铸银钱样本至陈廷敬处，请其验看。待来人走后，陈廷敬发现有一钱遗漏于案，便将其收起。后来，陈廷敬身至铜钱铸造现场，忽然心生惭愧：“吾誓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遂将此二钱如数奉还。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二钱说》，以示警醒，其严于自律的程度可见一斑。

顺势立法，制度反腐。陈廷敬心怀时务，看待问题切中要害，善于因势利导根除时弊，使官员想腐而不能。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康熙帝以宽仁治天下，当时又三藩平定，经济加剧复苏，但腐化也成风。陈廷敬对此痛心疾首，次年因势利导向朝廷上《劝廉祛弊请敕详议定制疏》，强调指出：“贪廉者，治理之大纲，奢俭者，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俭。”在他看来，治贪墨和廉洁是治国理政的总纲，奢侈和廉检又是贪与廉的根本。想要教育官员廉洁，必须先让他们做到勤俭。对于某些官员不能廉洁奉公的因由和危害，陈廷敬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其始由于不俭，其继至于不廉，其卒至于天下饥寒”。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陈廷敬请求朝廷“敕下廷臣，博考旧章，详议定制”。康熙帝接到陈廷敬的上疏，认为其切中时弊，遂下旨“格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务实，崇尚书俭至意”。自此，便从制度上保障了戒奢以俭的顺利倡行，同时避免了因官员奢侈贪腐而误国。

彼时，朝廷大员门生故吏遍布天下，难免在荐人用人上有徇私情，继而形成“团团伙伙”的腐败集团。如何做到用人唯廉，陈廷敬更是煞费苦心。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九月，陈廷敬上《请严督抚之责成疏》，一针见血地指出：“督抚之职在察吏”，“上官廉，则吏自不敢为贪；上官不廉，则吏虽欲为廉而不可得”，“方今要务，首在督抚得人。为督抚者既不以利欲动其心，然后能正身以董吏；吏既不复以曲事上官为心，然后能加意于民”。他认为，识察干吏是督抚的本职所在，而其自身的廉洁与否对属吏的行为养成具有直接的影响，唯有上下秉公而行才能换来吏治清明百姓满意。对此，康熙帝很认可，遂按章颁法，从制度上保障了朝廷用人的公正无私。

惩贪肃纲，以儆效尤。陈廷敬曾两次领衔都察院，身为左都御史对全国监察事务可谓尽心尽责。其在任上，惩贪制恶不畏权贵一心为公，使贪官污吏闻风丧胆，想腐而不敢。

云南巡抚王继文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将大量军饷肆意腾挪，还存在纵容属下贪污的劣迹。由于前期失察，这么一个阴奉阳违的封疆大吏，还“昭昭然”而倨平定三藩有功即将荣升云贵总督。陈廷敬洞悉问题所在，及时制止并揭露了这起“带病提拔”的闹剧。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上《抚臣亏饷负国据实纠参疏》将矛头直指王继文，揭露王继文的恶劣行径：“是一那移之间，而某侵没饷银已九十余万两矣。即使无侵没入己之弊，而身为封疆大吏，当军兴之际，不思裕国省饷，亏损国课几至百万之多，溺职不忠之罪，某虽百喙，何以自解乎？”并请求康熙帝下令严查严办。不久，王继文认罪伏法。“由是风纪肃整，中外大小吏莫不色动神摄”。

康熙年间，索额图和明珠明争暗斗，造成空前严重的党争局面，双方互不相让贪腐炽盛。一时间满朝文武大多争相依附，慌忙“站队”，但陈廷敬一身正气两不依附。同时，对腐败集团也绝不袖手旁观。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明珠因结党营私遭弹劾，被罢官回家，自此恩宠不再。陈廷敬察觉时机已到，遂向康熙帝进言，君子与小人的利害同殊：“君子光明磊落，即有过失，人所易见；小人巧佞回邪，患得患失，凡所以贪位固宠者，无所不至。又能形人之短，见己之长，能使人主信任而不疑，故得专权而肆其恶。”“小人谗害君子，不在大庭广众之际，而在于筵闲私语之时。使人主听受其言而不觉，故圣人比之为暮夜之贼，惟圣明之主严绝其端，则可以无此患也。”康熙帝似有警觉，让陈廷敬直述朝中小人。陈廷敬便将明珠党同伐异、贪恋权位、包庇贪腐、卖官鬻爵等罪行和盘托出，并向皇帝建议欲严办明珠，必先剪除其党羽。康熙帝遵其法而行，不可一世的权相彻底落败。

一生刚正不阿，翊赞圣治，陈廷敬为开创康乾盛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康熙帝赞曰“卿乃耆旧，可谓全人”，算是对其一生为官操守的高度褒奖，可谓名至实归。

（作者单位：江西省抚州市委党校）

文史天地

洗尽铅华始见真

□ 章　旺

作为一名参公人员，有幸赴中央党校参加全国党校系统青年教师培训班学习，机会尤为珍贵。在短短的五天里，我接受了一次系统性、高水平的理论学习，受益匪浅，反思很多，感受颇深。

“于细微处得真知”。从课堂上听到了一个关于日本人如何观察细致入微的事例，说的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学者根据中国报纸的几篇很平常的报道，推断出了中国在大庆发现了油田。这个事例对我触动很深刻。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搞学术研究，不一定非得是方兴未艾的课题才能出彩，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也能发现有价值的课题，“处处留心皆学问”。推人及己，确能引起很多反思。现在读报，通常只看大标题，有时候连时事都不关注，这样就很容易与时代脱节。加之长期在机关工作，更加偏安一隅之内，从外界获取的信息少，又没有钻研的那股劲，这种“懒散”不应当有，在今后工作和学习中，都会谨记住这一点。

返璞归真的文风。王东京副校长在谈到他们写的内参的时候，用了“很好看”一词来形容，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从这一点看，我们自己的科研成果可能有很多是不合格的。有一些写作现象很值得反思，如堆砌专业术语，或者阐释性的东西多，有见地的内容少，等等。科研成果是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更需要有更多的人能看得懂，用简练直白的语言反而能起到拙中藏巧的效果。试想，如果一份内参置于领导案头，还要领导费尽心思去抠字眼，成果转化率肯定会受影响。从行文文风的角度看，也引起了我的深刻反思——自己在写一些发言稿、工作总结中也有类似的毛病。就是咬文嚼字，强凑排比句，看似读起来朗朗上口，类似骈文，实则外表光鲜，内在匮乏。因此，务必要回归务实的文风。

“文章合为时而著”。这是我对调研工作最深的体会，之前看过一条新闻，说是我国目前的科技转化率只有10%，而发达国家则是40%。在学术研究层面，成果转化率应该更低。究其原因，关门搞研究多，紧贴省情、市情、乡情的少，科研成果与地区领导决策层的需求相去甚远，看似科研成果、论文数量不少，但基本属于“自娱自乐”，也就违背了研究的应有之义。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在讲课时说道，在南海调研的时候，只有踏上了岛礁，才能知道什么是南海问题。这些知识，坐在家里是没有办法知道的。他提到，党校的学员就是最好的调研对象，因为每一个主体班的学员都能代表一个特定人群。实际上，党校除主体班次外，各类特色专题培训班次其实也皆有调研价值。比如说我自己带过的基层党组织工作者班，就曾经让我感受深刻，仅仅一个下午的讨论时间，让我对基层党务工作的开展情形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这些比之前通过其他途径得来的都要多。以此类推，地税系统培训班、计划生育培训班、团干部培训班，等等，这些人群对于该领域的工作开展、问题矛盾等，都是最有发言权的，把他们的意见、建议，甚至客观看法收集起来，就是对该领域现状调查最权威的一份调研报告。

淡化功利性色彩。读书的目的有很多种，在学生时代，为了升学而读书。在工作中，我们为了提升专业素养、解决实际问题而学。从各方面看，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充满了功利的色彩，仅仅把读书作为一种手段，或者美其名曰提升自我。事实上，读书的本源不应是一种手段，就好比品茶，我们不只是为了解渴而已，而是品茶本身就是一种追求和境界。只有如此，读书的意义才不再被形式主义所束缚，读书本身的力量才会最大限度地迸发出来。此次在中央党校，再一次听到“要读原著”的呼吁。其实对于读原著，自己一直有这样的意识，但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很难做到这一点。一则是因为“懒”，若要从马克思的大部头著作里去学劳动价值理论、商品货币知识，那是件辛苦且“投入产出比”不高的事情；二则是因为“浮”，书在面前，但读不进去，难以深入理解。但不读原著的结果通常是，我知道物质是第一性，也知道矛盾论和认识论，但我不懂哲学。这种懒惰、浮躁的心理导致虽然本人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但所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部分少之又少。有感于此，打算用半年的时间，好好读一本社科类或哲学的著作，马克思·韦伯或黑格尔的，总之要读一本。

对于教学艺术的感受。中央党校教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互动”。这种互动可以分为授课中和授课后。授课中，通过提问的方式来互动，或者通过对某一个问题的牵引引发学员思考，或者用一些事例来让听课者轻松一笑，这样就能避免课程时间的冗长所造成的精神集中力下降问题。授课中的互动尤为讲求艺术，单纯地追求课堂气氛不行，因为学员是来学知识的；只抱着讲义灌输式地授课，也不行，因为知识很枯燥，学员很难做到始终聚精会神。因此，运用之妙，存乎于心，对于我们地方党校人而言，很具启发意义。此外，授课后的学员教授问答，这种互动更加直接。但个人认为，如果要借鉴中央党校这种授课方式，一定要在前期授课的过程中打好基础，因为倘若学员在课堂上昏昏欲睡了，既想不出来，也不会有什么有价值的问题可问。同时，对授课教师而言，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沉淀，做到脱离讲稿，也能为学员释疑解惑。

（作者单位：安徽省铜陵市委党校）

我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和感悟征文选登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　照排：中央党校报刊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